

## 書介：

###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sup>\*</sup>

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譯者：郭文襄、盧蜀萍、陳山

臺北：印刻文學，2011。

英文版：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林明波<sup>\*\*</sup>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中國在上世紀 50 到 60 年代之交付出慘重的代價，馮客把這段歷史稱為「中國史無前例的毀滅性浩劫」（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同時也是本書的副標題。有關大躍進運動及隨之而來的大饑荒，長久以來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系統性地探討這個問題的著作，卻相當稀少；本書為填補這個空白作出了有益的嘗試，馮客也憑藉本書獲得了

---

2013 年 7 月收稿，2013 年 10 月通過刊登。

<sup>\*</sup> 致謝辭：本文原為 101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永發老師開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二）」課程報告，筆者修改後投稿《史繹》，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龐志豪同學代宣讀。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珍貴意見。本文所有問題由筆者自負。

<sup>\*\*</sup>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98 級生、雙主修歷史學

英國廣播公司 2011 年度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馮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架構，指出大躍進的慘劇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極權體制一手造成的，幾乎每一個黨和政府的幹部都參與其中，最終把整個國家帶到崩潰的邊緣。他引用了大量檔案資料和訪談內容，揮舞著他的生花妙筆，試圖把這場災難的全景呈現在讀者面前。

全書分為六篇共 37 章。第一篇〈追逐烏托邦〉（The Pursuit of Utopia），講述毛澤東為了與蘇聯一爭長短，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經歷反右運動的洗禮，上至周恩來、鄧小平等高幹，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人人噤若寒蟬，沒有人敢對毛的激進做法提出異議，大家都投入了火熱朝天的「超英趕美」浪潮。在地方幹部的強制推動下，全民大修水利、大放衛星、大煉鋼鐵、大搞人民公社集體化。

第二篇〈穿越死亡谷〉（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為了保證城市居民生活品質和出口貿易平衡，大規模向農村徵糧，饑荒的苗頭開始出現，更被迫從「帝國主義」國家進口糧食。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糾正錯誤，結果掀起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潮，敢言幹部紛紛被打倒，已經無人可以制止這列瘋狂的列車前進。等到 1961 年大躍進完全失控，才由劉少奇、李富春等出面主持「策略性撤退」。

第三篇〈毀滅〉（Destruction），分述這場盲動冒進的生產運動，對農業、工業、貿易、住房和自然等國計民生領域造成的毀滅性破壞，超額的糧食徵收和人民公社管理混亂，使農村人口在生死線上掙扎。工業生產重量不重質，工人生活環境惡劣，使工

業產值大減。對計劃經濟的過份依賴使得商品奇缺，商貿流通陷入停頓。集體化把老百姓從他們的住房中趕出來，騰出來的空間用來建設政府的「面子工程」建築。為了大煉鋼鐵，樹木作為燃料被大肆砍伐，劣質水利工程使洪水的威力不減反增，空氣、江河湖泊被有毒化學物質污染。

第四篇〈求生百態〉（Survival），在生死邊緣，大小官民為求活路，紛紛各出奇謀以苟全性命於亂世。農村居民出逃避荒，城市裡黑市交易蓬勃，暗處有人偷摸搶劫，黨幹倒賣物資大吃大喝，以上行為完全脫離了計劃經濟和極權體制的設計框架，全國亂象紛呈。

第五篇〈弱勢群體〉（The Vulnerable），重點關注大躍進運動中的弱者：小孩、婦女與老人。在這個效率至上、「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年頭，他們被虐待凌辱最後身死的故事奏出一曲時代的哀歌。

第六篇〈死因〉（Ways of Dying），詳細分析了這場浩劫中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饑餓以外，還有勞累致死、傳染病、法西斯式暴力鎮壓與打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狀況。最後，馮客綜合手上各種資料及前人的研究，判斷在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不下於 4500 萬。

本書與其他研究大饑荒的作品相比，到底有什麼特色？馮客自己的說法是，以往的著作都把大躍進期間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如「反冒進」、廬山會議等）與民間的悲慘遭遇孤立開來，他的工作就是要將這兩個分離的層面進行連結，告訴我們黨國菁英如何

把這場史無前例的人禍加諸平民百姓的頭上。本書書名雖然只是《毛澤東的大饑荒》，但是要為災難負責的絕對不止元凶毛澤東一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省委書記）乃至小鄉村裡生產隊的頭頭，他們作為極權體制內部大大小小的螺絲釘，把中國變成了一台巨大的絞肉機，親手把無數鮮活的生命送入其中。幫凶的罪惡比起首腦有過之而無不及。

馮客最為自豪的是，本書近 95% 徵引的史料都是中共的原始檔案，<sup>1</sup> 而且都是經過他精心驗證，真實性很高。馮客很有辦法，能進入省和縣一級的檔案館調閱這些史料，至於中央層級的檔案，在可見的將來一般史家仍然無緣得見。不過，從本書看來，運用地方檔案文件已經足以讓本書的論證增添不少說服力。上文提到，馮客試圖把高層政治和民間社會結合起來，當中那個關鍵的連結，就是省、大區、鄉縣的一把手幹部，他們直接把中南海的意志貫徹執行，同時也把地方上執行的結果匯報給中央，作政策調整的參考。馮客指出，直接參考這些地方大員交上去的報告和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當中出於政治考量，一籬筐都是冠冕堂皇的話語和滲滿水份的政績，真實的情況卻乏善可陳。他轉而探詢政治利害關係較弱的官僚部門，如省的水利廳、林業廳、衛生廳和工業局的檔案，比較能夠真實的反映大躍進期間不同生產領域的狀況。<sup>2</sup> 至於各種統計數字，多採用 1962-1965 年中央和各地統計部門發佈的材料，因為災難結束後這些部門要重建自己的可信性，不得不對饑荒年頭的事情作客觀的回顧（頁 137）。馮客的做法是

1 〈專訪馮客 (2011.10.17)〉，《陽光時務週刊》網站，<http://www.isunaffairs.com/?p=555>（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27 日）。

2 馮客曾於 2012 年 5 月 3 日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作專題講座，曾論及檔案的使用方法。感謝師大史研所學長提供的資訊。

「讓檔案自己說話，讓讀者自行評判」，透過這些官方文件，大躍進期間的眾生相可謂躍然紙上，其中活生生的慘象也讓人不忍卒讀。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地方幹部面對大規模死人的結果實在是難逃罪咎。像甘肅張仲良、雲南謝富治等人，在地方上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瞎搞水利工程，引水道、建水庫，強逼農民進行超負荷體力勞動，結果導致大批人勞累致死，然而這些水利工程最後卻未能發揮灌溉的作用，人們都白死了（頁 57、59）。要鞭策人們如奴隸般幹活，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問題提到政治高度上，敢提出異議的人都被劃成右派，扣上「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的帽子進行批鬥，地方幹部們靈活地運用這招數，使得少數人吃盡苦頭，多數人默不作聲。在整個大躍進期間，幹部主導了多起暴力凌辱事件，總死亡人口中至少百分之六到八是被基層幹部及民兵直接殺死的（頁 267）。極權體制上行下效，黨幹揮動大棒鎮壓最終倒霉了老百姓，這個暴力模式被視為文革的預演，最後進化成「挑動群眾鬥群眾」，正式瓦解了最基本的社會倫理秩序。當然，幹部們也不是鐵板一塊、甘願乖乖作黨的螺絲釘，掌握權力的他們也面臨吃飯艱難的問題，由於獲得額外的計劃和市場資訊，因此可以進行投機倒把活動，大發橫財，工廠裡的工人、城市裡的小市民，紛紛依樣畫葫蘆做生意，沉醉於「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頁 193）。這是極權體制長久以來的弔詭：這邊廂國家竭力對個人和社會進行無微不至的滲透和控制，那邊廂人們的求生本能引發的各種反應卻形成對極權有意或無意的挑戰，迫使後者採取更高壓的手段遏止之，國家與社會雙方皆陷入這個死循環，最後只等待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的降臨。

中共在 1950 年代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發展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特點就是物資的生產數量和價格並不按市場供需決定，一切取決於國家權力者的政策偏好。換言之政治凌駕於經濟，計劃經濟的運轉，必須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作為後盾。如果要深究大躍進失敗的慘烈，不得不處理計劃經濟體制與這場盲目生產運動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書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大問題。

馮客在本書中毫不掩飾自己對計劃經濟嗤之以鼻的態度，並指出它是整場災禍的根源之一。在農業領域，計劃經濟使得農民沒有權力決定栽種的作物，也不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收穫。幹部對農業一竅不通，卻瞎指揮生產，栽種不合適的作物，導致田地幾乎顆粒無收。在浮誇風虛報產量的情勢下，在農村過度徵收糧食，使得農民們命喪黃泉，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和王任重等人難辭其咎（頁 140-141），譚震林更把糧食收集視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爭奪戰。

在工業方面，計劃經濟本來就擁有缺乏效率的隱憂，由於大躍進鼓動超額超規模生產，只注重擴大產量、縮短生產時間，不注重成本和品質，結果造成工業原料和設備的極大浪費，造出一大堆與廢物無異的劣等工業品。工廠把資源都投入到胡搞的生產當中，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卻日復一日惡化，使得他們更無心無力於工作之上，最後使得工業產值滑坡式直線下跌（見第三篇第 18 章〈毀了工業〉）。

馮客告訴我們，計劃經濟體制是毛時代中國的病灶，由於這套經濟制度先天不足，平日無事尚可勉強支撐，一旦遇上政治環境的急遽轉變，在好大喜功、違反客觀條件下讓權力任意妄為，

最後必然會出現毀滅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馮客讚頌自由主義市場的神奇功用，大饑荒當中的倖存者不少從黑市中獲得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城裡的幹部們也在大搞買賣，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真的沒有活路時，人們紛紛逃往香港——東方的自由柏林。

馮客專闢〈弱勢群體〉一篇介紹大躍進期間婦女、兒童與老人們的遭遇，又是本書另一個讓人欣喜之處；篇幅雖短，卻向我們演示了從其他角度切入中國現代史的可能性。近現代中國政治暴力與軍事殺戮不斷，不同的弱勢群體如何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嚴峻歷史環境下求存，一直以來史家對這個問題著墨有限。以大躍進為例，整個社會體制已經趨向軍事化，糧食嚴重不足，老弱又缺乏生產力，肯定成為人們首先拋棄的對象，殺害孩童和老人以奪取其配給口糧的事情，時有發生（頁 230）。因為「不勞動者不得食」，稚幼耆老也不得不硬撐上陣勞動，最後疲勞致死者大有人在。共產主義專門為他們設置了集體的幼兒園和老人院，但是這些地方的生活環境非常不堪，管理工作一片混亂，最後使得不少孩童老人因疏忽照顧而患病甚至身亡。婦女因為體質問題（懷孕、月經等），在超負荷的生產中更是吃盡苦頭，不少女性被幹部性侵犯，也有人為求獲取食物被迫出賣肉體。大躍進本來的目的是要創造出一個人間的共產主義天堂，結果卻把中國變成煉獄，地獄裡沒有仁義道德可言，只有赤裸裸的叢林法則，弱者要活下來注定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馮客在字裡行間並沒有嚴厲的道德批判，卻向我們拋出了一個歷史的大哉問：集體化逼使人們做出艱難的道德抉擇，是讓自己活下去，還是讓別人活下去？近現代中國人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天災人禍，是什麼因素影響著他們最後的選擇？

最後我們不能免俗，也要檢討一下大躍進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數目。馮客指出，這個問題永遠難找到正確答案，因為當時很少有可靠的數據被保留下來（頁 290）。馮客自己推斷的死亡人數至少是 4500 萬，他以上海人口學家曹樹基的數字（3200 萬，曹主要根據官方編纂的地方志中的數據來推算）為基礎，與自己找到的檔案交叉比對，發現死亡率至少被低估百分之 30 到 50，得出  $3200 \text{ 萬} \times (1+30\% \sim 50\%) = 4160 \text{ 萬到 } 4800 \text{ 萬}$ ，取中間約 4500 萬的最後結果。平心而論，馮客只是一名歷史學家而非人口學家，他的估算肯定存在可供商榷之處。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也有自己的算法，關鍵在於他一語道出了數字背後的意義：「我珍惜生命，每一個數字後面就是一片從生到死的生命。」北野武在談及 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災害死亡人數時，也曾言：「悲慟是一種非常私人的經驗。這次震災並不能籠統地概括為『死了兩萬人』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的事情發生了兩萬件。兩萬例死亡，每一個死者都有人為之撕心裂肺，並且將這悲慟背負至今。」百餘年的中國近現代史，因為內外各種暴力而流血死去的芸芸眾生不知凡幾，大躍進是近代中國暴力革命的另一個顛峰，這場試圖把一個人類史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送進共產主義天堂的實驗，以數千萬部悲劇收場結局。中國人不斷摸索著追趕西方、早日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大躍進把這個理想發展到極致，誠如馮客所言，它是中國現代史的核心。